

# 广大知识分子 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

朱 文 显

**内容提要** 根据马克思的论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资本主义社会属于雇佣劳动者,他们在阶级属性上同一般工人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或者说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本文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对这个问题认识的历史过程,并对什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广大党外知识分子属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范畴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阶级分析 知识分子 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

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在现在是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广大知识分子(即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在旧社会是否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长期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实际上也就是究竟应该怎样看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问题。80年代,学术界曾经对此作过有益的探讨,笔者也曾经发表了几篇有关的文章,如《学习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论述》(1983年)、《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85年)、《共产国际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党的知识分子政策》(1986年)等。以后又在《邓小平统一战线思想研究》<sup>[1]</sup>一书中作了进一步的阐述。现在看起来,总感到言而未尽,因而准备就此再谈点看法。

大家知道,所谓阶级属性问题,指的是某一社会群体在旧社会的生产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而这种地位,又是他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与否,占有多少,以及由此决定的分配关系所决定的。

在1978年3月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sup>[2]</sup>以前,我们党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的论断,影响最大的要数1956年1月周恩来同志《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肯定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队伍发生的巨大变化,得出了“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sup>[3]</sup>的重要结论。这个报告是胡乔木同志起草的。起草后周恩来同志召集中央“知识分子问题十人小组”和其他部门负责人反复讨论,其中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怎样确定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直到正式开会的前一天凌晨,周恩来

同志的这个意见才被通过。这就告诉我们,在当时刚刚经历了1955年的批判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以及由此引发的内部“肃反”那场政治风暴之后,在党内高层领导中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存在着严重分歧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得出这样的结论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而大家知道,这个结论实际上也并没有能够成为全党的共识。同年9月“八大”的政治报告就改变了这个结论,仍然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提法。而随着“反右派”的扩大化,就进而提出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基本上是资产阶级的,因而他们还是属于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在1958年3月的成都会议上,又提出了“两个剥削阶级”的概念,把知识分子当成了资产阶级的一部分。

现在看来,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周恩来同志关于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个提法还是有缺陷的,因为它可以很容易地从逻辑上推出他们本来还不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结论。而这样的结论,对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来说则是不妥当的。

那末,究竟应该如何认识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呢?

根据有关资料,“知识分子”这个词是19世纪60年代由俄国作家彼·得·鲍保雷金创造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全部著作中,只是偶而使用过,他们多是从知识分子所从事的职业来论述知识分子问题的。在列宁的著作中,“知识分子”这个词才被大量使用。至于什么叫“知识分子”,列宁认为是指那些“与体力劳动者相区别的脑力劳动者,一般指所有受过教育的人们,自由职业者(指英格兰人常说的脑力劳动工人)”<sup>[4]</sup>。不过,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所说的知识分子,根据党的有关方针政策,应该主要是指那些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医院、科研机构、新闻出版单位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工资以为生活的全部或主要来源的办事员、教员、医生、专家、教授、记者、编辑等。或者说,在旧社会,这部分被称为“职员”的人,是知识分子主要的和基本的队伍。此外,我们也历来把“自由职业者”和大中学校的青年学生当作知识分子看待。

对于上述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明确指出:“资产阶级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的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其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进一步指出:工程师、机械师是“高级工人”<sup>[5]</sup>。办事员是“产业资本家的雇佣工人”<sup>[6]</sup>。这是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恰恰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劳动,因而也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或者说,把以脑力劳动为主或者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各种劳动者分离开来,分配给不同的人。但是,这一点并不妨碍物质产品是所有这些人的共同劳动的产品,或者说,并不妨碍他们的共同产品体现在物质财富中;另一方面,这一分离也丝毫不妨碍: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对资本的关系是雇佣劳动者的关系,是在这个特定意义上的生产工人的关系。所有这些人不仅直接从事物质财富的生产,并且用自己的劳动直接同作为资本的货币交换,因而不仅把自己的工资再生产出来,并且还直接为资本家创造剩余价值。他们的劳动是由有酬劳动加无酬的剩余价值组成的。”<sup>[7]</sup>此外,马克思还指出:“在学校中,教师对于学校老板,可以是纯粹的雇佣劳动者,这种教育工厂在英国多得很。这些教师对学生来说虽然不是生产工人,但是对雇佣他们的老板来说是生产工人。老板用他们的资本交换教师的劳动能力,通过这个过程使自己发财。戏院、娱乐场所等等的老板也是用这种办法发财致富。在这里,演员对观众来说,是艺术家,但是对自己的企业主来说,是生产工人。”<sup>[8]</sup>至于为什么把这些人当成雇佣劳动者,马克思在谈到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时,言简意赅地讲明了道理:“同样,工资也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一处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另一处表现为分配的规定。如果不是规定为雇佣劳动,那末,它参与分配的方式,也就不表现为工资”<sup>[9]</sup>。在旧社

会，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工人一样，都是靠出卖自己的劳动靠工资生活的。事情就是这样明明白白地摆在我们面前的。总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里受雇于人的广大知识分子属于雇佣劳动者，他们在阶级属性上同产业工人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应该是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理论的一个根本出发点。

## 二

在中国革命的过程中，由于共产国际及其领导者斯大林、布哈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左”倾错误的影响，加之如同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过程一样，我们党对广大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认识也是由不完全正确而逐步走向正确的。在周恩来同志的知识分子问题报告之前，这个问题比较集中地反映在我们党《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中。这个文件是1933年制定的，在1948年和1950年曾经作过两次大的修改和补充，我们可以从中看出对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的认识过程。

在1933年的文件中说：“知识分子，不能看做一种阶级成份，知识分子的阶级成份，依其所属的阶级决定”，“如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是富农。”这里的“阶级成份”，实际上也就是阶级属性。这个文件把阶级出身和阶级成份混为一谈，实际上是一种“家庭出身决定论”。这个错误的理论在各个革命根据地的“肃反”中，使大批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知识分子被当成地主和富农受到了错误处理，造成了令人痛心的严重后果。

1948年，在任弼时同志主持下，对1933年的文件进行了修改，纠正了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上“家庭出身决定论”的错误。修改后的文件指出：“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依其家庭成份决定，其本人的阶级成份依本人取得主要生活来源的方式决定。”具体说来，在阶级出身上，“例如家庭属于地主的是地主出身，家庭是中农的是中农出身等”；在本人成份上，“本人当地主的是地主，本人当资本家的是资本家，本人当自由职业者的是自由职业者，本人当职员的是职员，本人当军人的是军人等”。这就把知识分子的阶级出身（即家庭出身）和个人成份严格的区别开来，在正确地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上具有里程碑的重大意义。不过，所谓知识分子“本人当地主”、“本人当资本家”云云很值得推敲。因为知识分子既然是专指脑力劳动者，那末一旦当了地主或资本家，似乎就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范畴了。所以这里讲的“知识分子”，恐怕只可以理解为“有知识的人”。

1950年对这个文件进行的第二次修改，是在周恩来同志主持下进行的，并作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份的决定》的第二部分明令公布。这次修改后的文件在知识分子阶级属性问题上除了保留1948年文件的正确内容外，作了以下重要补充：“（一）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的办事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二）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专业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份与一般职员同。但私人经济机关和企业中的资方代理人不得称为职员。（三）国民党政府的各级负责官吏，不得定为职员成份。”这三点补充在确定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上，具有历史性的伟大意义。因为：首先，它第一次确定了职员（包括一般职员和高级职员）是旧社会知识分子主要的和基本的队伍，而职员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其次，它把私人企业中的资方代理人 and 国民党政府的各级负责官吏同其中的办

事人员(即职员)严格的区别开来。至于这些资方代理人和负责官吏算不算知识分子,又当别论。另外,1948年的文件和这个文件都提到“自由职业者”,指的是一部分依靠独立营业为生,但不剥削别人的医生、教师、律师、新闻记者、作家、艺术家等使用脑力的劳动者。这部分人虽不是受雇于人的雇佣劳动者,但他们以脑力劳动为生,也是知识分子的组成部分。总之,根据中央上述文件,所谓知识分子主要应该是指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广大的职员,另一部分是自由职业者。而第一部分人占绝大多数,他们按其阶级属性,在旧社会本来就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不是解放后才变成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这么一个重要文件并没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贯彻,以致于事隔六年之后,当周恩来同志提出广大知识分子已经成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时候,还经过了反复的讨论。而直到上述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这个问题才得到了最后的解决,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八年之久。这是多么大的历史教训啊!

在革命战争年代,我们曾经把知识分子当作小资产阶级看待。这从阶级属性上看,对于“自由职业者”来说,还是正确的。但对广大“职员”来说,就不对了。因为他们受雇于人,靠工资生活,他们的“资产”(那怕是“小资产”)又在哪里呢?对此,毛泽东同志曾经正确地指出:这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生活条件”和“政治立场”来看的<sup>[10]</sup>,而并不是给他们划分阶级。因为所谓阶级是一个纯经济概念。中央有关文件规定:“划分阶级应只有一个标准,即占有生产手段(在农村中主要是土地)与否,占有多少与占有关系相连带生产关系(剥削关系)”,如果将“政治态度和思想也列为标准之一”,就是“‘左’倾错误”<sup>[11]</sup>。应该指出,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党的一些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也曾经提出过正确的看法。例如,早在1937年5月,刘少奇同志就指出:“各学校中的教职员与各机关的职员,也是工钱劳动者”<sup>[12]</sup>,也就是靠工资生活的雇佣劳动者。1948年8月,陈云同志也指出:“工人和职员,同是日寇、国民党政府企业的雇佣劳动者。”<sup>[13]</sup>建国前夕刘少奇同志视察天津时,又多次讲了这个问题。他指出:“如果是大学教授,即令其家里有几百亩地,但他主要是靠薪水生活的,可以加入工会,因为其要求与工人是一致的。……我们许多同志只同情穷人,这是好的,因为有可能争取为无产阶级。但要懂得,不要光看表面,光看生活。聘请就是雇佣,大学教授挣几百斤米,是无产阶级。而农民只挣几十斤米,生活很苦,但不算无产阶级,只是半无产阶级而已。”<sup>[14]</sup>这段话从雇佣关系上讲高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讲得何等深刻啊!

### 三

民主革命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中,知识分子是被当作小资产阶级看待的。但是,建国之后,在邓小平同志在全国科学大会上的讲话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基本上一直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大帽子。因此,要正确认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还不能不涉及有关“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问题。

“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是列宁首先使用的,而且在他的著作中数以百计。但是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列宁并没有下过明确的定义,而且有些地方用得也不一定妥当。例如,列宁曾经多次把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说成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甚至说马克思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怎么办?》中,列宁在谈到工人的社会民主意识要靠外面灌输进去时说:“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按他们的社会地位来说,也

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这里我们撇开恩格斯的情况不谈。关于马克思的经历,列宁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马克思1818年出生在一个律师的家庭,大学毕业后想当教授未果,当了《莱茵报》的主编。但不到一年,这个杂志就因为宣传革命被查封了。1843年马克思在巴黎创办《德法年鉴》时,已经作为一个革命家出现,那时他才25岁。次年,他便同恩格斯在一起,创立了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sup>[15]</sup>。至于马克思的一生生活的艰辛,我们可以从他给恩格斯的上百封书信中窥见一二。1854年9月13日他在信中说:“我又不得不向你借钱了,尽管这使我很不愉快;但是,外界压力迫使我不得不这样做。……我家在危机时通常使用的特殊手段又已耗尽,什么东西都当光了,同西班牙的国库一样。”<sup>[16]</sup>在1861年12月9日的信中又说:“肉商和杂货店逼迫我给他们开了1月9日到期的期票,一张十英镑,另一张十二英镑。虽然我根本不知道,这笔钱该怎样偿付,但我不能把事情闹到法院去,因为那样的话,我家里一切都要完蛋。”<sup>[17]</sup>1862年2月25日的信中,又谈到维也纳《新闻报》不用他的文章,得不到稿费,而孩子又生病,慨叹“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活下去”<sup>[18]</sup>!同年6月18日又在信中告诉恩格斯,由于巨大的经济压力,“妻子天天对我说,她还不如同孩子们进坟墓,的确,我也不能责怪她,因为我们由于目前处境而忍受的屈辱、痛苦和可怕的事情实在非笔墨所能形容。”<sup>[19]</sup>我们从上述马克思的经历来看,哪里有一点“资产阶级”的影子呢?他的社会地位,只能算是一个穷苦的“自由职业者”。他自己也说过他的收入来源于稿费,是一个“撰稿人”<sup>[20]</sup>。我们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但正如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的:对待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的著作,都不能搞“凡是”,他们自己也从来没有讲过“凡是”<sup>[21]</sup>。我们只能完整地、准确地理解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体系。这是个是否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原则问题。

笔者认为:如何正确地界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这是因为:一方面,我们不应该把知识分子看做是一种阶级成份。从阶级属性上看,他们中的绝大多数属于雇佣劳动者,另一些则属于自由职业者,其社会地位并不完全一致。另一方面,我们还应看到,在旧社会知识分子这个社会群体,在政治上又是分属于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的。按照列宁的说法,有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有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有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也有农民阶级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在研究知识分子问题时,既有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其阶级属性的问题,又有一个如何正确划分其政治归属的问题,这是两个不同性质的问题。而关于如何界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很明显是属于后者。

邓小平同志在谈到旧社会知识分子的不同情况时指出:“在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脑力劳动者。有些人是完全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他们同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处在对立的地位。但就在那个时候,也有很多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如同列宁所说,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是他们本人并不是资本家,而是学者。他们的劳动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这一般是社会制度决定的,并不是出于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同那些绞尽脑汁直接为反动统治阶级出谋划策的政客是截然不同的。马克思曾经指出,一般的工程技术人员也参与创造剩余价值。这就是说,他们也是受资本家剥削的。”<sup>[22]</sup>笔者认为,这一段话由于是在科学大会上讲的,所以针对的是科学技术人员,但其基本精神对于社会地位与科学技术人员相同或相似的广大教师、职员等也是普遍适用的。可以说,邓小平同志的这段十分精辟的论述,除了阐明了广大知识分子属于雇佣劳动者之外,也为我们正确地界定什么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供了理论依据。它明确地告诉我们:第一,知识分子虽然都是脑力劳动者,但他们在旧社会的情况是不尽相同的。第二,很多知识

分子在旧社会尽管浸透了资产阶级偏见,但我们并不能因此把他们划到“资产阶级”中去。这也表明了邓小平同志作为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始终坚持了不能将政治态度和思想作为划分阶级成份的标准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第三,在旧社会,广大知识分子的成果为剥削者所利用并不是出于自愿,因而过去说他们“为资产阶级服务”是不正确的。第四,所谓“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能是那些自觉地、主动地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并绞尽脑汁为其出谋划策的资产阶级“政客”。而这样的知识分子,在我们这个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只能是极少数。

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同志曾经对我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进行过历史的分析。认为他们是“五四”运动的右翼。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他们中的大部分人就站到了反动方面去了。而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他们又附和国民党反动派文化上的资产阶级专制主义和“限共”、“溶共”政策。这种“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毛泽东认为仅仅是以胡适为代表的“一部分所谓欧美派的文化人”<sup>[23]</sup>。这就告诉我们,毛泽东当时在界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时,还是比较审慎和实事求是的。

如上所述,由于在过去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内在使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时不够慎重和科学,带有很大的主观随意性,因而要对其进行必要的清理,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 四

和广大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相联系,还有一个统一战线理论方面的问题,即广大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党的统战对象,究竟是属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统战范畴,还是属于工人阶级同其它阶级或阶层的统战范畴。在1982年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把“非党的知识分子干部”列为统战对象<sup>[24]</sup>,接着就引发了一场争论。有的同志认为:知识分子既然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就不应该再列为统战对象,甚至说这样做是“降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笔者认为,之所以产生这样的问题,主要是由于这些同志对于党的统战政策,缺乏全面的了解。

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有两个组成部分:一部分是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并同其他各国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另一部分是工人阶级同其他阶级和阶层建立联盟,争取最广泛的同盟军,以完成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这个问题在过去发表的不少论著中已有论述。针对以上问题,在这里再强调三点:

第一,从马克思和列宁的统一战线理论和实践来看,主要还是工人阶级内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创立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统一战线理论,提出“共产党人到处都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并且“到处都努力争取全世界的民主政党之间的团结和协议”,以争取最广泛的同盟军。但他们主要的还是在强调工人阶级内部的团结统一问题。在宣言的第二部分,就着重讲“共产党人同一般无产者的关系”,讲“共产党人不是同其他工人政党相对立的特殊政党”。后面,又用了很大篇幅批判了各种在工人运动中产生了不良影响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流派。最后,还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一伟大号召作结。所有这些,目的都是为了实现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可以说,他们为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大联合奋斗了终生。列宁更加具体地阐述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统一战线问题,提出了“要利用一切机会,哪怕是极小的机会,来获得大量的同盟者,尽管这些同盟者可能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不可靠的、

有条件的”<sup>[25]</sup>。但是，直到1922年4月列宁还认为：“统一战线策略的目的和意义在于吸收愈来愈广泛的工人群众参加反对资本的斗争”<sup>[26]</sup>。这就足以证明他对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的高度重视。

第二，为什么过去我们对工人阶级内部统一战线问题缺乏应有的认识，以至于前几年一些同志还把它当成一个新问题呢？这是因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对于马列主义的统战理论作了创造性的重大发展，并作为“三大法宝”之一。而毛泽东同志讲的统一战线，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和带买办性质的大资产阶级）和其他阶级（包括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问题<sup>[27]</sup>，而很少或不讲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问题。这就给人造成了一种错觉：似乎统一战线只是讲工人阶级同其他阶级或阶层的问题。其实，关于工人阶级内部的统一战线，张闻天（洛甫）同志在1937年就讲过。他说：“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建立工人阶级的政治的、经济的统一战线，实行工人阶级的行动统一与组织统一。”<sup>[28]</sup>周恩来同志在建国初期也指出：“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性组织。但有没有统一战线性质呢？应该说有。”并且引用了季米特洛夫的话，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具体分析<sup>[29]</sup>。

第三，在新时期，知识分子固然已经被肯定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但是，知识分子又是工人阶级内部的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阶层。由于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差别将长期存在，因而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内部的这一特殊阶层也将长期存在。他们同一般工人相比，在知识积累、劳动方式和工作条件等方面都有自身的特点，需要加以特殊的照顾。另外，党的统一战线从一定意义上说是党与非党的联盟。各个领域的统战工作对象绝大多数又是非党知识分子，尤其是各民主党派的成员更以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这就决定了他们既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是统战工作的主要对象。邓小平同志说：“知识分子问题，统战部应注意。知识分子的安排、待遇，包括政治的、生活的，别的单位不能从总的方面去考虑。……统战部要研究，要管，要综合反映这方面情况，反映全貌。”<sup>[30]</sup>因此，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党的统战对象，完全是为了尊重和照顾他们的特点，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以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中的重要作用。因此，那种认为把党外知识分子作为统战对象是“降低了知识分子的地位”的说法是一种误解，应该予以澄清。

#### 注释：

- [1]李学明、朱文显主编，成都出版社1992年出版。
- [2][21][22]《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89页，第38—39页，第88—89页。
- [3]《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62页。
- [4]《列宁全集》俄文第5版，第8卷，第309页。
-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461页。
-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324页。
- [7][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1，第444页，第443页。
-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745页。
- [10]《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641页。
- [11]《中央工委关于阶级分析问题的指示》，1947年12月31日。
- [12][28]《六大以来》下册，第117页，第126页。
- [13]《陈云文选》（1926—1949年），第247页。

[14]《在天津干部会上的讲话》，1949年5月16日。后来，中央决定不再使用“半无产阶级”这个概念。

[1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26卷，第48—50页。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8卷，第389页。

[17][18][19][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0卷，第208页，第216—217页，第251页，第465页。

[23][27]《毛泽东选集》第2版，第2卷，第700和704页，第606—607页。

[24]《新时期统一战线文献选编》，第185页。

[25]《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39卷，第50页。

[26]《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第43卷，第128页。

[29]《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第173页。

[30]《邓小平论统一战线》，第159页。

## · 学术动态 ·

### 全国高师系统文科学报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师大召开

全国高等学校文科学报研究会高师系统学术研讨会，5月9日至5月13日在成都市四川师范大学召开。来自东北、华北、西北、华东、中南、华南和西南各地的代表41人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四川师大文科学报编辑部负责筹办，四川师大党政领导和各有关单位对会议的召开十分重视，提供了多方面的帮助。

会议开幕式由筹备组负责人、四川师大文科学报主编朱文显教授主持。联络中心主任濮侃教授作了工作报告。报告指出，自从1993年6月在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召开全国高师系统文科学报工作研讨会并成立联络中心以来，两年中主要进行了通讯联络、交流经验、促进发展的工作。“中心”还利用一些全国性会议的机会，开碰头会研究具体工作，重点是筹备本次研讨会。四川师大校长杨泉明教授向会议致以热烈的祝贺，并就师范特色发表了重要意见。四川刊协副会长侯克强先生，全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副理事长肖汉森编审在会上致了贺词。杨焕章理事长，潘国琪、张积玉、田祖武副理事长等来信祝贺会议召开。

本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是：文科学报改革与高师特色，有14篇论文围绕这一主题开展了探讨，北京师大连铤的《高师院校学报理应突出师范特色》，重庆师院许廷桂的《高校学报师范性之我见》、辽宁师大贾红棉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高师教育改革》等文章，都有独到的见解，引起与会者的广泛兴趣。学报编辑规范化的问题也受到了应有的重视，四川师大李大明的《关于引文引号、文末点号和注码号位置处理的思考》等文章被大家认为是很有见地的编辑学论文。

本次会议开得很成功，体现了学报研究会“学术年”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参加会议的人数不多，但学术层次较高，三分之二以上系高级职称。论文质量、数量都比较理想，有虚有实，对学报的改革能起推动作用。会上发言广泛，讨论深入，有时还展开学术争鸣；会后交流会体与经验，增强了友谊。

会议期间，联络中心成员陈世澄、居思伟、张祖彬等同志分别主持了研讨会，同时讨论了联络中心的工作。决定增补华东师大施有文同志为联络中心秘书长，四川师大学报李大明同志、湖南长沙水电师学院学报廖小平同志分别接替朱文显、陈其相两位老同志参加联络中心的工作。下届学术研讨会，预定1997年9月在大连市召开，会议筹备工作请辽宁师大学报编辑部负责。（全国高师文科学报联络中心秘书处）